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主办 第2期（总第410期） 2024年2月5日

- ◆ 2024 中央一号文件（全文）新华社（1）
- ◆ 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的“四个必须”程国强（7）
- ◆ 学习、研究、宣传吴仁宝老书记的心得、体会和实践刘济民（9）
- ◆ 刘宏昌同志给郭书田同志 2024 年春节来信及回信刘宏昌 郭书田（13）
- ◆ 杜润生谈农村研究赵树凯（15）
- ◆ 谁在种地？不是问题的大问题徐 勇（22）
- ◆ 从“村落终结”到“社区再造”郭占锋 田晨曦（24）
- ◆ 人生漫漫 岁月如歌张效菊（28）
- ◆ “无锡模式”凸显中国经济治理活力刘少山（31）
- ◆ 多维度看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程 郁 宁 夏 殷浩栋（32）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

新华社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亲自谋划推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下简称“千万工程”），从农村环境整治入手，由点及面、迭代升级，20年持续努力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造福了万千农民群众，创造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成功经验和实践范例。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循序渐进、久久为功，集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阶段性成果。

做好2024年及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为底线，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为重点，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强化农民增收举措，打好乡村全面振兴漂亮仗，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一）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扎实推进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把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到大面积提高单产上，确保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实施粮食单产提升工程，集成推广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巩固大豆扩种成果，支持发展高油高产品种。适当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合理确定稻谷最低收购价。继续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稻谷补贴政策。完善农资保供稳价应对机制，鼓励地方探索建立与农资价格上涨幅度挂钩的动态补贴办法。扩大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实施范围，实现三大主粮全国覆盖、大豆有序扩面。鼓励地方发展特色农产品保险。推进农业保险精准投保理赔，做到应赔尽赔。完善巨灾保险制度。加大产粮大县支持力度。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深化多渠道产销协作。扩大油菜面积，支持发展油茶等特色油料。加大糖料蔗种苗和机收补贴力度。加强“菜篮子”产品应急保供基地建设，优化生猪产能调控机制，稳定牛羊肉基础生产能力。完善液态奶标准，规范复原乳标识，促进鲜奶消费。支持深远海养殖，开发森林食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多渠道拓展食物来源，探索构建大食物监测统计体系。

（二）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健全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制度体系，落实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明确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坚持“以补定占”，将省域内稳定利用耕地净增加量作为下年度非农建设允许占用耕地规模上限。健全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制度，完善后续管护和再评价机制。加强退化耕地治理，加大黑土地保护工程推进力度，实施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和耕地非法取土。持续整治“大棚房”。分类稳妥开展违规占用耕地整改复耕，细化明确耕地“非粮化”整改范围，合理安排恢复时序。因地制宜推进撂荒地利用，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对确无人耕种的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多途径种好用好。

（三）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质量第一，优先把东北黑土地地区、平原地区、具备水利灌溉条件地区的耕地建成高标准农田，适当提高中央和省级投资补助水平，取消各地对产粮大县资金配套要求，强化高标准农田建设全过程监管，确保建一块、成一块。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等直接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分区分类开展盐碱耕地治理改良，“以种适地”同“以地适种”相结合，支持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推进重点水源、灌区、蓄滞洪区建设和现代化改造，实施水库除险加固和中小河流治理、中小型水库建设等工程。加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管护。加快推进受灾地区灾后恢复重建。加强气象灾害短期预警和中长期趋势研判，健全农业防灾减灾救灾长效机制。推进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动。

（四）强化农业科技支撑。优化农业科技创新战略布局，支持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加快推进种业振兴行动，完善联合研发和应用协作机制，加大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选育推广生产急需的自主优良品种。开展重大品种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推动生物育种产业化扩面提速。大力实施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完善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开辟急需适用农机鉴定“绿色通道”。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条件建设，强化公益性服务功能。

（五）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聚焦解决“谁来种地”问题，以小农户为基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社会化服务为支撑，加快打造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素质生产经营队伍。提升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生产经营水平，增强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和标准体系建设，聚焦农业生产关键薄弱环节和小农户，拓展服务领域和模式。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生产、劳务等居间服务。

（六）增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调控能力。健全农产品全产业链监测预警机制，强化多品种联动调控、储备调节和应急保障。优化粮食仓储设施布局，提升储备安全水平。深化“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加大农产品走私打击力度。加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消费监测分析。

（七）持续深化食物节约各项行动。弘扬节约光荣风尚，推进全链条节粮减损，健全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机制。挖掘粮食机收减损潜力，推广散粮运输和储粮新型装具。完善粮食适度加工标准。大力提倡健康饮食，健全部门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监管体系，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二、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八）落实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压紧压实防止返贫工作责任，持续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成果。对存在因灾返贫风险的农户，符合政策规定的可先行落实帮扶措施。加强农村高额医疗费用负担患者监测预警，按规定及时落实医疗保障和救助政策。加快推动防止返贫监测与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互联互通，加强跨部门信息整合共享。研究推动防止返贫帮扶政策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政策衔接并轨。

(九) 持续加强产业和就业帮扶。强化帮扶产业分类指导, 巩固一批、升级一批、盘活一批、调整一批, 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可持续发展。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保持总体稳定, 强化资金项目绩效管理。加强帮扶项目资产管理, 符合条件的纳入农村集体资产统一管理。提升消费帮扶助农增收行动实效。推进防止返贫就业攻坚行动, 落实东西部劳务协作帮扶责任, 统筹用好就业帮扶车间、公益岗位等渠道, 稳定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

(十) 加大对重点地区帮扶支持力度。将脱贫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试点政策优化调整至 160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施, 加强整合资金使用监管。国有金融机构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金融支持力度。持续开展医疗、教育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和科技特派团选派。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向脱贫地区倾斜。支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可持续发展。易地搬迁至城镇后因人口增长出现住房困难的家庭, 符合条件的统筹纳入城镇住房保障范围。推动建立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

三、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

(十一)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坚持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 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并举、产加销贯通、农文旅融合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支持打造乡土特色品牌。实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工程, 推进乡村旅游集聚区(村)建设, 培育生态旅游、森林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 推进乡村民宿规范发展、提升品质。优化实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项目, 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十二) 推动农产品加工业优化升级。推进农产品生产和初加工、精深加工协同发展, 促进就近就地转化增值。推进农产品加工设施改造提升, 支持区域性预冷烘干、储藏保鲜、鲜切包装等初加工设施建设, 发展智能化、清洁化精深加工。支持东北地区发展大豆等农产品全产业链加工, 打造食品和饲料产业集群。支持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主产区建设加工产业园。

(十三) 推动农村流通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 健全县乡村物流配送体系, 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 大力发展共同配送。推进农产品批发市场转型升级。优化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建设, 加快建设骨干冷链物流基地, 布局建设县域产地公共冷链物流设施。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 推进县域电商直播基地建设, 发展乡村土特产网络销售。加强农村流通领域市场监管, 持续整治农村假冒伪劣产品。

(十四) 强化农民增收举措。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 持续壮大乡村富民产业, 支持农户发展特色种养、手工作坊、林下经济等家庭经营项目。强化产业发展联农带农, 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涉农企业扶持政策与带动农户增收挂钩机制。促进农村劳动力多渠道就业, 健全跨区域信息共享和有组织劳务输出机制, 培育壮大劳务品牌。开展农民工服务保障专项行动, 加强农民工就业动态监测。加强拖欠农民工工资源头预防和风险预警, 完善根治欠薪长效机制。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 推广订单、定向、定岗培训模式。做好大龄农民工就业扶持。在重点工程项目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积极推广以工代赈, 继续扩大劳务报酬规模。鼓励以出租、合作开发、入股经营等方式盘活利用农村资源资产, 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四、提升乡村建设水平

(十五) 增强乡村规划引领效能。适应乡村人口变化趋势, 优化村庄布局、产业结构、公共服务配置。强化县域国土空间规划对城镇、村庄、产业园区等空间布局的统筹。分类编制村庄规划, 可单独编

制,也可以乡镇或若干村庄为单元编制,不需要编制的可在县乡级国土空间规划中明确通则式管理规定。加强村庄规划编制实效性、可操作性和执行约束力,强化乡村空间设计和风貌管控。在耕地总量不减少、永久基本农田布局基本稳定的前提下,综合运用增减挂钩和占补平衡政策,稳妥有序开展以乡镇为基本单元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整合盘活农村零散闲置土地,保障乡村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用地。

(十六)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因地制宜推进生活污水垃圾治理和农村改厕,完善农民参与和长效管护机制。健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置体系,完善农村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分类梯次推进生活污水治理,加强农村黑臭水体动态排查和源头治理。稳步推进中西部地区户厕改造,探索农户自愿按标准改厕、政府验收合格后补助到户的奖补模式。协同推进农村有机生活垃圾、粪污、农业生产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十七)推进农村基础设施补短板。从各地实际和农民需求出发,抓住普及普惠的事,干一件、成一件。完善农村供水工程体系,有条件的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暂不具备条件的加强小型供水工程规范化建设改造,加强专业化管护,深入实施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专项行动。推进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推动农村分布式新能源发展,加强重点村镇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规划建设。扎实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完善交通管理和安全防护设施,加快实施农村公路桥梁安全“消危”行动。继续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和农房抗震改造,巩固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成果。持续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发展智慧农业,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实施智慧广电乡村工程。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统筹建设区域性大数据平台,加强农业生产经营、农村社会管理等涉农信息协同共享。

(十八)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优化公共教育服务供给,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实施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加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服务能力建设,稳步提高乡村医生中具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人员比例。持续提升农村传染病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逐步提高县域内医保基金在乡村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比例,加快将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健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因地制宜推进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鼓励发展农村老年助餐和互助服务。健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激励机制。加强农村生育支持和婴幼儿照护服务,做好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残疾人等关心关爱服务。实施产粮大县公共服务能力提升行动。

(十九)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一体化推进乡村生态保护修复。扎实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推广种养循环模式。整县推进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加强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源排查整治。加强食用农产品产地质量安全控制和产品检测,提升“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食品安全监管能力。推进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强化重大动物疫病和重点人畜共患病防控。持续巩固长江十年禁渔成效。加快推进长江中上游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扎实推进黄河流域深度节水控水。推进水系连通、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复苏河湖生态环境,强化地下水超采治理。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探索“草光互补”模式。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鼓励通过多种方式组织农民群众参与项目建设。优化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健全对超载过牧的约束机制。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实施古树名木抢救保护行动。

(二十)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和治理能力,促进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优化县域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构建以县城为枢纽、以小城镇为节点的县域经济体系,扩大县域就业容量。统筹县域城乡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管护,推进

城乡学校共同体、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将城镇常住人口全部纳入住房保障政策范围。

五、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二十一）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强化县级党委抓乡促村责任，健全县乡村三级联动争创先进、整顿后进机制。全面提升乡镇领导班子抓乡村振兴能力，开展乡镇党政正职全覆盖培训和农村党员进党校集中轮训。建好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村级组织体系，推行村级议事协商目录制度。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健全选育管用机制，实施村党组织带头人后备力量培育储备三年行动。优化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选派管理。进一步整合基层监督执纪力量，推动完善基层监督体系，持续深化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加强乡镇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加大编制资源向乡镇倾斜力度，县以上机关一般不得从乡镇借调工作人员，推广“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等做法，严格实行上级部门涉基层事务准入制度，健全基层职责清单和事务清单，推动解决“小马拉大车”等基层治理问题。

（二十二）繁荣发展乡村文化。推动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书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乡村篇。改进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向村庄、集市等末梢延伸，促进城市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增加有效服务供给。深入开展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宣传教育活动。加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强化农业文化遗产、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整理和保护利用，实施乡村文物保护工程。开展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坚持农民唱主角，促进“村BA”、村超、村晚等群众性文体活动健康发展。

（二十三）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创新移风易俗抓手载体，发挥村民自治作用，强化村规民约激励约束功能，持续推进高额彩礼、大操大办、散埋乱葬等突出问题综合治理。鼓励各地利用乡村综合性服务场所，为农民婚丧嫁娶等提供普惠性社会服务，降低农村人情负担。完善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孝老爱亲等约束性规范和倡导性标准。推动党员干部带头承诺践诺，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强化正向引导激励，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广清单制、积分制等有效办法。

（二十四）建设平安乡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排查预警、多元化解机制。健全农村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持续防范和整治“村霸”，依法打击农村宗族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持续开展打击整治农村赌博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加强电信网络诈骗宣传防范。开展农村道路交通、燃气、消防、渔船等重点领域安全隐患治理攻坚。加强农村防灾减灾工程、应急管理信息化和公共消防设施建设，提升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加强法治乡村建设，增强农民法律意识。

六、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二十五）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体制机制。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改革完善“三农”工作体制机制，全面落实乡村振兴责任制，压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明确主攻方向，扎实组织推动。加强党委农村工作体系建设，强化统筹推进乡村振兴职责。巩固拓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成果。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落实“四下基层”制度，深入调查研究，推动解决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优化各类涉农督查检查考核，突出实绩实效，能整合的整合，能简化的简化，减轻基层迎检迎考负担。按规定开展乡村振兴表彰激励。讲好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二十六）强化农村改革创新。在坚守底线前提下，鼓励各地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强化改革举措集成增效，激发乡村振兴动力活力。启动实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整省试点。健全土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探索防止流转费用不合理上涨有效办法。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严格控制农村集体经营风险。对集体资产由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登记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名下实行税收减免。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农垦改革和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

（二十七）完善乡村振兴多元化投入机制。坚持将农业农村作为一般公共预算优先保障领域，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确保投入与乡村振兴目标任务相适应。落实土地出让收入支农政策。规范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政策工具，支持乡村振兴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强化对信贷业务以县域为主的金融机构货币政策精准支持，完善大中型银行“三农”金融服务专业化工作机制，强化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支农支小定位。分省分类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化险。创新支持粮食安全、种业振兴等重点领域信贷服务模式。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发挥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和政府投资基金等作用。强化财政金融协同联动，在不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前提下，开展高标准农田和设施农业建设等涉农领域贷款贴息奖补试点。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有效防范和纠正投资经营中的不当行为。加强涉农资金项目监管，严厉查处套取、骗取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二十八）壮大乡村人才队伍。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加大乡村本土人才培养，有序引导城市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下乡服务，全面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强化农业科技人才和农村高技能人才培养使用，完善评价激励机制和保障措施。加强高等教育新农科建设，加快培养农林水利类紧缺专业人才。发挥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等作用，提高农民教育培训实效。推广医疗卫生人员“县管乡用、乡聘村用”，实施教师“县管校聘”改革。推广科技小院模式，鼓励科研院所、高校专家服务农业农村。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铆足干劲、苦干实干，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向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扎实迈进。

（来源：新华社，2024 年 1 月 1 日）

新时代中国粮食安全的“四个必须”

程国强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军的新时代。新时代下，对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考量要有“四个必须”。

第一，粮食产业必须适应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新需求新趋势。我国食物消费将进入总量增加、结构升级、多元健康的新阶段。但我国农业资源环境约束将越来越紧，粮食扩面增产、提质增效的难度将越来越大，新时代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的形势和挑战将更加复杂严峻。

今后我国将保持水稻、小麦的高水平自给，有能力牢牢守住确保口粮绝对安全的战略底线，但部分谷物以及大豆等饲料原料供需缺口扩大、自给率进一步下降的局面难以逆转。随着国际局势的日趋复杂，我国肉类、植物油等食物供给保障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将进一步增加，我国食物安全保障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第二，必须为应对世界新的动荡变革期的挑战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农产品国际供应链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日趋严峻。新时代以新发展格局增强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要求加快构建国家粮食安全新格局，聚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把粮食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保供稳价能力和农产品国际供应链抗风险能力。

第三，必须补齐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短板弱项。国内稳产保供体系的短板表现在农民种粮成本高、收益偏低，种粮积极性不高，农业结构性矛盾突出，适应消费升级的粮食高质量发展滞后；储备调控与应急体系中的保障结构与布局需进一步优化，调控能力要进一步加强，供应链“最后一公里”问题突出；全球农业供应链缺乏主动权和竞争力。目前我国在全球供应链的主要参与方式是直接贸易，以进口为主，且进口来源高度集中，结构单一，对供应链上端的掌控能力还需加强。

第四，必须加快构建国家粮食安全新格局。要将我国现行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从“三位一体”升级为“五位一体”的新机制。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必须根基稳固。要牢牢守住口粮绝对安全底线，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多元食物供给体系发挥统筹协调作用。要树立大农业观、大资源观，优化配置农业资源、统筹利用国土资源，形成与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结构与布局。

粮食高质量发展要高质高效。加快推进粮食高质量发展，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推动粮食产业转型升级，全面提高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实现粮食安全和现代高效农业相统一。

粮食储备与调控体系要调控有力。国家粮食储备功能更加健全、布局与结构更加合理、管理体制机制更加完善。粮食产购储加销综合协同保障能力显著增强，粮食保供稳价调控体系健全有效、应急保障能力全面提升。

农业食品全球供应链要安全有韧性。全球农业贸易投资与市场监测预警体系健全完善，全球性农业食品企业稳步成长，“一带一路”农业国际合作平台作用显著，安全可控、持续稳定的农业食品全球供应网络全面形成。

（作者：原国务院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CMF，2023 年 12 月 29 日）

学习、研究、宣传吴仁宝老书记的心得、体会和实践

刘济民

一、我对吴仁宝老书记的评价

他是一面旗帜，旗帜是信仰。

他是一盏明灯，明灯是方向。

他是一部经典，经典是伟业。

他是一座丰碑，丰碑是崇高的思想境界。

他是一位伟人，伟人是事业的高度。

他是一个深厚的政治思想宝藏，宝藏是政治思想和崇高精神的永恒价值。

二、吴仁宝精神

坚定信仰，坚守信念；

敢于担当，善于担当；

实事求是，敢于突破；

超时奋进，忘我奉献。

三、吴仁宝老书记的伟大实践

他是决心改变华西村贫穷落后面貌、敢于担当、善于担当的实践者。

他是带领华西村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舍命奉献的先驱者。

他是奔跑在我国农村改革开放最前沿、为乡村全面振兴超时奋进的先行者。

他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登高望远、奋力前行、无私无畏的探索者。

以上这样的实践，正是吴仁宝老书记带领华西村民奋力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农村出发的基点。

四、吴仁宝老书记崇高的思想境界

他有着高远的目光，有着宏伟的战略格局，总能坚持鲜明的华西特色，始终赢得历史的主动。

他勇于面对风险，敢于果断决策，始终善于把握难得的历史机遇。

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善于正确决策，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他始终保持真正共产党人的政治清醒和坚定，有着善于超前布局的忧患意识，每临大事总能从容、冷静应对。

五、华西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基本经验

(1) 坚持强有力的共产党基层组织的领导。

(2) 有吴仁宝、吴协恩为强村富民舍命奉献的两位非常好的带头人。

(3) 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形成对全体村民共有经济的强有力的支撑。

(4) 坚持全方位改革、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全村经济高质量快速发展。

(5) 实行全体村民参与的股份合作制。从实际出发采取按劳分配、按资本分红和按需分配三种分

配形式。

- (6) 坚持富民至上，实现全体村民的高水平共同富裕。
- (7) 坚持科技创新，成为推动全村经济高质量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
- (8) 坚持全体村民行使真正的民主权力。
- (9) 坚持吸引和培养各方面的青年人才，为全村不断注入新鲜血液。
- (10)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11) 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完美融合、相互促进。

六、共产主义因素在华西的初步探索

- (1) 在全国生产力水平最高的村庄之一。
- (2) 实现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没有贫富差别，正在缩小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
- (3) 乡村里的繁华城市，城市里的美丽乡村。没有城乡差别，没有工农差别。那里是美丽的华西村、幸福的华西人。
- (4) 村民是爱党爱国爱华西，爱亲爱友爱自己。华西村民是真正的博爱、大爱，是人类最高尚的美德。
- (5) 村民共有的、强大的、不断增长的集体经济。
- (6) 没有贪腐，没有恐惧，没有黑恶势力，没有仗势欺人，没有巧取豪夺，没有黄赌毒偷骗，没有刑事犯罪。
- (7) 空气清新，人文和谐，充满活力。全体村民是真正的安居乐业。
- (8) 老有所养，少有所育，人人都有免费受教育的机会。敬老、尊老、爱老，成为全体村民的终极幸福。
- (9) 那是一片净土，一片沃土；那是圣洁的殿堂，村民的福地，真正的人间乐土。
- (10) 全体村民是物质、精神双富有。村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明程度在不断提高。

七、为什么是华西成为天下第一村？

因为华西村有个叫吴仁宝的农民共产党员。

为什么是吴仁宝成就了天下第一村的华西伟业？

因为吴仁宝有着一般共产党员所没有的革命自觉。

八、我学吴仁宝、学华西村的重要成果

- (1) 长期研究乡村企业

吴仁宝老书记是我研究乡村企业的启蒙老师，华西村是我研究乡村企业的重要基地。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曾在中央和地方报刊发表多篇研究乡村企业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是 1995 年 9 月 7 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的《农民的创举——关于促进我国乡镇企业发展和壮大的几个问题》一文。这篇文章按照李鹏总理、温家宝等领导同志审阅后的意见，作过反复的修改。文章发表前后，我曾在中央党校，在中央和国务院一些会议上，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四川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以及在农业部、江苏省的一些会议上，就乡村企业问题讲过多次，反响强烈。

1990 年初，我在南京出席江苏省委七届九次全委扩大会，我在会上就乡村企业问题有个专题发言。那次会议期间，我同仁宝同志住在一个房间，我们朝夕相处、彻夜长谈，他特别赞赏我对乡村企业的热情和积极的态度。他对我说：“你在无锡工作，一定要支持乡镇企业；如果不支持乡镇企业，你这个市委书记很难当得牢。”我在江苏省委那个会议上的发言，非常尖锐地指出：许多地方以“改革”、“改制”之名，把村民集体所有的乡村企业变成个别有权有势者及其亲属们巧取豪夺的猎物，成为极少数人

的私有财产。我特别强调：农民集体所有的乡村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村集体经济的强大支柱，是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柱石；我们对农民集体所有的、以公有制经济为基本特征的乡村企业的认识和支持，要坚定不移、坚信不移。乡村企业的丰功伟绩必定永载史册！我那个发言曾引起一些震动，反响热烈。直到那次会议后的十多年，吴仁宝老书记对我那个发言仍然给予热情的鼓励。我对老书记说：“那都是我向您、向华西学习的成果。”

（2）拜老书记为师

我1984年到华西村调研、选点，是我第一次接触华西。从1984年到现在的四十年中，我每年都要到华西去的。到那里学习、调研、求教、参加会议，等等。这四十年中，来华西一百多次总是有的。我每次到华西，总是有一种异样的、非常奇妙的感觉，是一种进天堂、上党校、朝拜圣地的感觉。我确实是恭恭敬敬地去华西拜师、朝圣的。

我在无锡工作期间有个做法，即在农、工、商、教、军各行各业都有联系点，华西是我首选的、最重要的联系点，是我的一个综合性的联系点。

在无锡那些年，每有大事我总是首先想到向老书记请教。我去华西，尽可能住一晚，同老书记促膝谈心，了解社情民意，请教大政方略，听取宝贵意见。老书记总是直言不讳，倾心相见，我感觉特别温暖，受益匪浅。

1989年5月我任无锡市委书记后，市委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全市农村学华西。当然，我自己首先要学好。向老书记学习，向协恩书记学习，向华西的父老乡亲们学习，直到现在。

（3）全家定居无锡

我1980年至1982年在黑龙江省北大荒农垦一个机械化大型国营农场带职锻炼两年。带职期满回到北京，总觉得锻炼得不够。在那样的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很想到经济发达地区的基层去，小试身手，增长才干，做点实事。

历经三、四年的反复选点和艰苦努力，在当时农业部林乎加、刘锡庚、朱荣等几位老部长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1986年初到苏州市委带职两年，任市委副书记。

我自己要求下去带职锻炼，不是去镀金，不是为了提拔，是要搬家、转关系，长期在那里工作，为人民群众做点实事。

两年带职期满后，由我代为管理的农业部和国务院办公厅的十四位青年干部先后回到北京原单位，只有我一个人坚决要求留下来。

经过非常艰难曲折的反复争取，农业部党组和江苏省委同意我留在苏州。1988年初正式转关系。苏州很快给我安排了很好的房子，还没来得及搬家，1988年8月调无锡市委工作，我很快搬家，全家定居无锡，直到现在。

这一切同吴仁宝老书记有什么关系呢？

三十多年前，即改革开放初期，我选择到苏州带职（不选择带职不可能成功），后定居无锡，原因很多，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就是我要学吴仁宝老书记，想在无锡这样经济发达地区的基层为人民群众做点实事。

正式留在苏州工作后，我还是想到农村基层去。我最初是选了离上海很近的（我老伴是上海人）苏州市所属昆山东莞镇的一个村，想在那里做副支书、副村长。我没有仁宝同志那样高的思想境界和工作能力，如果让我在村里做正职，我做不了，只能做个副职。苏州市委、昆山县委研究后不同意作这样的安排。他们说村里没有副职。这样，我只好继续留在苏州工作。

我在苏州、无锡工作期间，曾有四次提拔、重用的机会，1988年在苏州带职期满后，拟调任江苏

省委农工部部长。在无锡工作期间，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前先拟调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后拟调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还拟安排我筹备、组建中国出版集团。这几次提拔、重用，我都毫不犹豫地谢绝了。其中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不愿意离开基层，尤其不愿意离开我曾经付出辛勤劳动的无锡。

我从来不追求在大机关做大领导，从来不追求高官高薪，我只追求在苏州、无锡那样的经济发达地区的基层为人民群众做点实事。我这个人，能做点实事就是最大的满足。

以上就是我多年来学吴仁宝老书记的成果和实践。

（4）奇人必有奇事

在我和老书记交往的几十年中，接触到许多新奇的事，使我很受教益。

2003年夏天，华西村传出奇闻，一直表示要工作到八十岁的老书记，突然宣布退居二线，他所担任的华西村党委书记、华西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经村党委研究决定，让位给三十九岁的、老书记最小的儿子吴协恩担任。老书记那年七十六岁。2004年初我去华西看望老书记，我直截了当问他：“听说您退下来了，是真退还是假退？”他说：“我是半退。我现在是副职。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能正能副。”这是典型的吴仁宝语言，吴仁宝气质，实在是佩服！他当时是华西集团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我又问他：“您打算什么时候全退呢？”他说：“还是我过去说过的，八十岁全退。”

老书记让位给他的小儿子协恩，一时间又引起人们的关注。曾有领导同志问我：“吴仁宝是不是搞家族制？”我也曾经就家族制这个问题，问过老书记，他回答得很坦然，并不回避。他说：“我是人民的服务员。我这一家是为老百姓服务。不是为自家，是为大家。这样的家庭，我看多一点好。”仁宝同志说的当然是实情。他有四儿一女，还有女婿，我都熟悉。他的儿女和女婿个个能干，个个优秀。仁宝同志曾多次对我说：“我吴仁宝如果搞个体，早就是亿万富翁了。我不搞个体。我不要个人这个大富翁，我要华西村的农民家家都成为大富翁。”华西村民是高水平的共同富裕。在老书记和协恩书记的领导下，华西村民早已实现了“家家都成为大富翁”。这就是仁宝同志和他的子女们的高风亮节、远见卓远、博大胸怀。

老书记的新奇事还可以列出许多，我就不更多地一一列举了。

（5）吴仁宝老书记对我的信任和关心

当年，无锡新兴公司邓斌非法集资案，涉案金额巨大，曾经震惊全国。我1993年调北京后，中纪委派出专案组审查调查我同新兴公司的关系，从1994年末一直查到1996年6月。正是专案组对我进行审查期间，大约是1995年，有一天吴仁宝老书记突然来到中南海我的办公室。我发现老书记那天特别严肃，没有以往那种慈祥、亲切的笑容。他坐定后，突然指着我大声吼叫：“刘书记，人家都说你有问题！”我明白他来中南海看我的意图了。我立即站起来，也指着他大声吼叫：“老书记，人家都说我有问题，你今天来了，就说明我没问题了！如果我真有问题，你早就躲的远远的了！”我大声吼叫完之后，我们俩人都哈哈大笑！这真是：天地苍苍，人海茫茫，实在是知心难得、知己难得啊！还有什么比知己更宝贵的啊！当时我真是感动得掉眼泪了！需知1995年中纪委专案组对我审查还没结束呀！

总之，学习、研究、宣传吴仁宝老书记，是我整个革命生涯中特别重要的历程，长期坚持几十年，一直没有停息。

（作者：原国务院秘书长、无锡市委书记。此文是刘济民同志向国务院办公厅离退休干部局领导去看望他时的汇报稿，2023年12月整理。）

刘宏昌同志给郭书田同志 2024 年春节来信及回信

郭老书田同志：

春节好！给您拜大年，祝先生身体好，幸福快乐。时间如白驹过隙，记得去年春节我们曾通话，互发短讯，我还劝您搁笔，多休息，但是您哪闲得下来，以笔代戈，不停地战斗，工作着。

《通讯》仍然是我阅读的头等参考，其中文章留存下来。《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历史经验研究》和《农村经济学术与政策观点综述》两篇论著，各约有两万字，是先生抱病期间写的，供中央领导及有关部门，受到重视和采纳。粮食问题，是您多年关注研究的课题，我注意到，国家统计局对 2016 年、2017 年粮食总产量有所调整，均提升到了 1.3 万亿斤，这是否与先生年前所披露，粮食丰收有虚假报道的谏言有关。与前些年，您较早提出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不正之风，待到第三年上才得以重视。可见，“在科学的发展上，对严重谬论见的揭露，其价值不亚于创造性的发现。”（引自孙万鹏灰学文集 X 卷）

先生给《许小平读书文丛》作序，谈自己读书与学习方法，读后颇受益。

《通讯》所载名人传记，我喜欢看，如杜润生、吴象、萧克、吴仁宝。王充的“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真是经典，千古名言。先生讲“人虽圣贤，孰能无过”，改的好。周其仁，大学问家，文风朴实近人，拜杜老风范，滋润该郎是也。赵树凯写 80 年代农村改革风云，掌握顶头史料。武大贺雪峰教授春节回家，还作调整研究，提出要保护“中坚农民”。

《通讯》编辑很用心，涉猎摘编一些报刊文章，挺有意思。摘《农民日报》《隐入尘烟》出圈：感悟乡土的力量所讲的：“给农民在城里建了楼房，但马有铁夫妇却不愿意去，还发出了：人住在这里，驴子、猪、鸡搁哪里住”的担忧……

如此多篇，读后知“三农”状况，心里有些亮堂，但忧虑又产生了，农村振兴，实行现代化，不拖后腿，很难啊！

好了，多日不见，甚是想念，望您多多注意身体，颐养天年，幸福快乐，也祝家人及子女们幸福快乐！

也代我问候致谢《通讯》编辑主编。祝他们春节快乐幸福。

致

敬礼

刘宏昌

2024 年 1 月 28 日

尊敬的宏昌同志：

您好！1月28日满腔热情的来信，今天收到了，立即拜读，深受教益。你对《通讯》的喜爱与对我的关切，深致谢意，已将来信转给《通讯》编辑部拜读。

王充的名言，是萧克老将军亲笔书写的，刊于《炎黄春秋》，我不禁深感古代大哲学家的伟大与老将军的身体力行，是我学习的榜样，而且努力以此要求与约束自己。说实在的做的很不合格。

您对我的诚挚忠告，我牢记心间，并努力逐步实现。有深远意义的龙年就要来临，祝您与全家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不多说了，您也要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郭书田

2024年1月31日

（郭书田：原农业农村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原所长，高级经济师。刘宏昌：人民日报高级编辑、记者，市场报原副总编）

杜润生谈农村研究

赵树凯

在新中国的政策研究历史上，杜润生是一位贡献卓著的重要人物。杜润生对于政策研究的建树，既表现于八十年代农村改革初期，他主持起草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也表现于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时期，他辅佐邓子恢试图纠正毛泽东的激进政策而被贬斥；还表现在战争时代和建国之初，他对于土地改革政策的调研探索受到毛泽东赞赏。

杜润生精于报告写作和文件起草，也是难得一见的演讲家，其良好文风堪称典范。他的文章，内容平实，文字洗练，“不晦于深，不坠于浅”，或长或短，皆如行云流水。他读书多，学问好，但在文章中从来不“掉书袋”，不寻章摘句以炫弄博学。读他的文章，经常感觉到，他无意于故作惊人之语，但却往往语出惊人；他的讲话，慢条斯理，有时甚至细声细语，但却是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他既善于三言两语，点到为止；也善于长篇大论，出口成章，一气呵成。有时候作一场报告四个小时，听者却依旧兴味盎然，视同享受。

关于怎样做政策研究，杜润生既有丰富生动的经验分享，也有深邃旷远的理性阐发。本文结合作者本人在九号院的工作经历，试图梳理分析杜润生关于政策研究的精神追求、理念理论和方法原则。也许可以说，杜润生是在致力于开辟政策研究的新传统。他的一系列观点表述和行动探索，对于当下的智库建设和政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一、九号院里听“精神”

1982年8月，我进入九号院工作。此前四月，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两个机构合署办公，杜润生担任主任。我被分配在秘书处。1989年下半年，这两个机构相继被撤销。

九号院时期，我作为秘书处工作人员，有多种机会直接为杜润生服务。杜润生经常召集、主持各种会议，这些会议规模不等、层次不同，包括农口部长、省市领导的汇报讨论、各类专家学者座谈、来自县乡的基层官员座谈、乃至机关内部工作会议等等。由于秘书处岗位职责所系，我经常在这些会议上服务，有机会听杜润生的各种谈话和讲话，并在他的直接指示下处理一些具体事务。从初入九号院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多年，然而当初的很多工作情景，甚至于杜润生的言谈、表情和举止，却依然如在眼前。在九号院工作的后两年，我对秘书处工作萌生倦意，曾要求转岗到专题研究部门，也曾要求去做内部刊物编辑，却都没有成功。现在想来，秘书处工作虽非研究一线，但是就政策研究的见识和修炼而言，也有很多独特优势。

农研室撤销后的一段时间里，杜润生成为清查处理的对象，面临着作为党员能否登记的问题。当时，王郁昭主任主持清查处理和善后工作，我是王郁昭的秘书。在这个过程中，我对杜润生有了另一种接触和了解。九十年代上半叶，我们仍然在九号院办公，杜润生、王郁昭、朱厚泽、吴象等人经常相约一起

到地方调研，就像一个调研小分队。在这种情况下，我随同他们出差，为他们跑前跑后地服务，参加各种会议，在火车、汽车、饭桌和会议上，也参与他们的闲谈。这种生活对于我来说是重要的学习熏陶。

在我的印象中，整个九号院时期，杜润生经常强调研究人员的历史使命感和工作精神。在宣布农研室和农研中心成立的第一次全体人员会议上，杜润生说：“我们的任务明确，就是要探索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走什么样的道路，制定什么样的方针政策。这都是带战略性的问题。每个人要有历史使命感，要树立一种目标。”杜润生提出，要以“三种精神”作为对每个工作人员的要求：“第一是要有献身精神，希望大家不计个人利益，为农民献身；第二要有民主精神，要群言堂，不能一言堂，大家畅所欲言，只有搞好民主，机关的水平才能不局限于领导人本人的水平；第三，要有科学精神，即克服思想中的惯性，实事求是，按照事物的本身面貌来了解事物。”

杜润生要求，九号院要把这三种精神作为单位工作的检验标准。他提出，他本人作为领导，以“三种精神”要求大家，也请大家以“三种精神”要求他。在一般情景下，关于“三种精神”的表述难免给人以假大空之嫌，像是一种空泛的号召，但是，在1980年代的时代背景下，在当年九号院的特定场景中，再联系到九号院内部的政策研究活动，特别是杜润生个人在政策研究中的努力，“三种精神”这样看似一般化的口号背后却颇有实在的内容。

二、谈智库建设——“要办成知识库，不要办成货栈”

在部署九号院机关工作的时候，杜润生多次从中国改革发展的宏大历史背景出发，讨论智库机构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他说：“我们的国家机关，发号施令的人应该少一点，搞调查研究的人，应该多一点”。“每个领导者都不可能长期专注一件事，对于某件事常常接触一下又放下。靠一年仅来接触几次就来解决问题是危险的。因此，必须有一批固定的专业化人员，对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经常性的、持续的调查研究工作。”“要防止领导者个人的偏好引起政策的偏离，就要注意发挥调研和咨询机构的作用；要有这方面的称职的专门机构”。

九号院机构成立之初，杜润生提出，农研室“是中央的知识库，也可以说是智力机构”。他指出：“我们要注意知识积累，建立‘知识库’，多储藏点东西。而不要办成简单的‘货栈’，今天进货，明天批发。这个机构应该是一个知识的仓库，保存各种材料，随时备用。”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杜润生意在把九号院机构建设成为一个高水平的智库机构。他提出智库要避免办成“货栈”，也是有感于历史上一些党政研究机构的缺陷。或者说，他是在努力吸取由于政策研究系统缺陷而误导政策的历史教训。对于九号院机构的设计，他曾数次向当时主管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汇报，亲自拟写了“农村政策研究室组织要点”，并报送万里、赵紫阳和胡耀邦审定。

为了办好九号院智库，杜润生强调“机关对内要开放，对外也要开放”。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九号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工作机制，成为一个富有活力、促进创新的政策研究机构。

对内，九号院建立了高度灵活的内部组织结构。九号院的内部机构，我们通常称为“三室六组”。“室”是行政部门，是编制内的局级机构，即办公室、资料室和联络室。办公室负责秘书行政工作，下设秘书处、行政处、机要处、人事处等单位；资料室负责资料信息服务工作，后来从农村信息联系点发展分化出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和统计分析室。联络室负责外部研究力量的组织协调，设课题委托处、成果处、办事处等单位。“组”是研究单位，按照研究课题设立六个组，分别是综合组、体制组、生产结构组、流通组、战略策划组、理论组。1987年春天，在杜润生的亲自倡导主持下，经过全机关人人参与的大讨论，根据新的农村改革形势和任务，九号院重新调整了研究组的设置。

九号院内部的职务体系也高度灵活，用今天的观点来看，甚至是有些混乱。其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行政职务与级别分离”、“专业职务和行政职务并行”。即研究人员分别按局级、处级等相应待遇，如“副处级研究员”“正局级研究员”，但是，级别与具体职务并不对应，如“研究组”组长可以由副局长级研究员担任，后期甚至有正处级研究员担任组长，而正局级研究员可能是组员。1987年下半年，九号院内部开始评定专业技术职称。这样，那些行政级别较低的研究人员，则可以按照专业职称相应提升工资等待遇。

对外，九号院建立了强大而广泛的研究网络，实现了自身研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有效整合。农研中心设有理事会和评议委员会。理事会主要由有关党政部门负责人、科研机构负责人和若干著名专家学者组成，杜润生担任主任。理事会每年开一次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研究的重大选题和方向性问题。评议委员会主要由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负责研究成果的评审。农研中心还从高校和科研机构、党政官员中聘请了特约研究员、通讯研究员，总数约有百人。

九号院的工作氛围相当宽松开放。现在人们还在津津乐道的是：当时内部称呼很少称职务，人们习惯称杜润生为“老杜”，而不是“杜主任”或“杜老”。其他主任和秘书之间的称呼也是如此，例如，经常有秘书称自己的主任为“老刘”，主任则称自己的秘书叫“小王”。这当然是整个八十年代高层政治生态的特色，但在九号院内部，这种轻松气氛尤为突出，言论空间的宽松更加可以想见。有九号院的同事当时到杜润生的办公室可以说是“推门就进”，此话虽然不无夸张，但是大体属实。客观上来说，这种情况与单位里人员数量少有一定关系。我刚到九号院工作时，机关大概只有五六十人，即便七年后解散时，也有一百二三十人。但是，这种宽松氛围的出现，有赖于杜润生的工作作风，是他在刻意营造一种自由宽松、畅所欲言的氛围。这也许可以说体现了他所说的“民主精神”。他在一次会上说：“我多年来的体会是，思想不能近亲结婚，而是要远缘杂交，互相交锋。这就需要民主的气氛，每个人都参与，都充分发表意见。否则是很危险的。”

尽管九号院内的自由氛围如此浓烈，杜润生仍然不满意。1984年初，在九号院工作人员会议上，他指出：“我们的机关作风不生动，不主动，还有官僚主义习气，多年来形成的机关化作风要改变，要形成有自己特色的、科学的、战斗的作风，机关要对内对外开放，要是一个大熔炉，能沸腾、活跃起来，使每一个人能得到训练。既要保证个人正常发展，又要保证整体的协同效益。我们不提倡封建人身依附，不是等级制，是岗位分工不同。干群之间不是猫鼠关系，而是平等关系”。现在，很多人回忆起九号院，常常首先提到的是那种宽松、活泼、创新的氛围环境。

九号院的经验显示，成功的政策制定过程应当是开放的过程。开放型政策研究需要以开放型政治过程为依托，而政策研究的开放性又进一步促进政治过程的开放性。这或许是八十年代中国政治的重要特点。

三、谈调查方法——“要有客观态度，要拉长线”

杜润生重视深入农村搞调查，重视从基层收集信息，这种工作作风从他在国家农委工作时期就开始形成了。1979年初，国家农委成立，杜润生担任副主任，主管政策研究。在他的主导下，农委政策研究室组织在校大学生利用假期回农村调查，称为“百村调查”。当时，九号院动员组织北京高校的在校生回村调查，给这些大学生补贴回家路费，有时还给学生开介绍信。九号院当时有些年轻同事，就是因为在学校读书时参加这样的调查而被分配进来。农研室成立后，农村调查进一步规模化、常态化，并成立了专门机构。

杜润生谈调查方法，首先从强调调查的极端重要性开始。在一次会议上，杜润生谈到课题委托工作，他明确要求：“所有的委托研究课题都要到农村做实地调查，不做调查的研究课题，就不要委托”。为了强调调查的极端重要性，他用开玩笑的口吻继续说：“不做调查的课题，如果要委托也不要委托别人，可以统统委托给我”。

为什么要重视调查？杜润生主要是从历史的教训中说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1983年3月，在全国农村信息点工作座谈会上，他说：“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凡是注重调查研究的时期，就是我们的工作最健全的时期；凡是不注意调查研究的时期，就是工作上出毛病的时期，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保守主义、冒险主义都出来了”。“多少年来，对于我们干扰的问题，是调查材料的取舍问题。任何搞调查的人的思想，都不免受当时舆论的支配，免不了迎合性。因此，过去形成一种说好一切都好，说坏一切都坏的状况。去年起草文件时，我专门把公社化时期的调查研究材料拿出了两大本看了看，上边把那时发生的事说得一无缺点，一切都好，一切都发展，事实上并非如此。可见取舍材料是很关键的。”

怎样才能做好调查？杜润生经常强调的是两点：第一要有客观性，第二要有长期性。

关于在调查过程中要坚持客观性的态度，杜润生说：“搞调查研究就要尽量客观一点。不要随便舍弃不支持你的见解的东西，也不要专门去找那种事实。任何一个概念，一个规律，一个法则，都不会和客观事实完全吻合。不能说我讲了一句话，到处都适用。”他还专门讲到如何处理在调查过程中获得的材料：“概念和材料不要绝对化，调查研究也不能绝对化。也许你舍弃的材料，恰恰就是我们最需要研究的问题。因此，我们搞调查研究，不要害怕不符合既定模式，既有的观念，既成的理论，调查结果与既定的结论观点可以是不一样的。”“不要一发现不符合自己口味的东西，就批评人家观点不对。如果我们搞调查研究，不能抛弃一些过时的个别结论，不能反映事物的另一方面，这样的调查材料无助于指导变革”。

关于调查工作要长期坚持，杜润生指出调查要“长期化、系统化”。他强调做调查要注意长期积累。他说：“我们的调查研究要拉长线，不是只拉短线。有些材料是马上就要用的，有些材料是为以后使用准备的。”

1983年初，九号院开始部署在全国每个省选取十个左右的村作为调查基地，同时，在全国19个地区57个县设立长期信息点。在这次工作会议上，杜润生解释了为什么要在党政系统之外单独建立自己的信息联系点。他说：“建立信息点是一个新做法，目的是使信息更直接来自基层。通过行政的渠道反映也可以，但信息要经过加工，如果经过县、地区、省逐级加工，费时太长，而且可能有失真之处。我们想直接得到一些信息，这就是原来建立信息点的本意”。针对参加会议的有些地方官员提出，需要中央发文件专门部署再启动的建议，他说：“大家反映目前搞力量不够，机构人员不定不好搞。这当然有道理。不过这件事最好早些准备，准备越早越好。全国搞三百多个村的调查研究，早一点部署为好。不一定非要等中央发指示不可。中央总是说要调查研究，没有任何文件上说不要搞调查研究，不要先行试点。所以不要等中央文件再干”。（杜润生文集上册，第131页）。

杜润生对研究人员提出调查方面的严格要求：新来机关的青年每年至少到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半年。他说：“不这样亲身体验，就不了解农村，就不够格做农村工作”；他还提出，机关的青年人要一个月举行一次报告会，每个人要报告自己一个月以来的调查研究新发现。1982年秋天，九号院曾经下派人员到安徽凤阳县挂职副乡长。我本人曾报名，但是没有获准，秘书处派了别的同事去。

杜润生不仅要求九号院工作人员经常深入农村搞调查，而且他自己就是做农村调查的榜样。根据高

文斌秘书的记录，从1980年到1984年间，杜润生走遍了全国25个省240个县。他下农村调查，走街串巷，深入农户，很少两三天就回北京，经常下去一次就是十来天，有时候一次外出调研就达到一个月的时间。在外地出差的时候，经常晚上还要开座谈会。有的偏远地方，他有意重复去调研，过两年去一次，通过前后对比发现问题和经验。杜润生的这种调查方法，与现在的高级干部下基层调研，显然有多方面的不同。一个七十岁的老人，以这样的方式做农村调查，凝聚了一种特殊的精神。

当年九号院能起草出至今备受称道的五个一号文件，扎实的基层调查是重要基础。正如在杜润生追思会上有学者所指出的：好的政策文件不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

四、谈研究方法——“多用归纳法，少用演绎法”

在多种场合，杜润生经常阐述他关于研究方法的经验和观点，告诉大家怎样在调查基础上展开研究。

我印象最深的是，杜润生结合政策研究中的常见问题，特别要求大家在研究中避免犯两种错误：

第一，注意避免政策意见的一面倒，他告诫大家，研究中要注意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不能被单方面意见所左右。他讲到：“调查完了要注意研究，研究的时候，要注意正反两个方面的意见。要搞点逆向推理法。这样干有什么好处，换一种办法又有什么坏处？当你提倡一件事情的时候，就要注意为什么有人反对，他的根据是什么；当你反对一件事情的时候，要注意研究为什么有人支持，它为什么能够产生，为什么能够发展。比如‘大锅饭’是怎么产生的？因为它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一部分农民的要求。铁饭碗的存在，也是有它的客观根据。改变它，要有一个分寸。铁饭碗要反对，但是没有一个人碗也不行。去掉铁饭碗只能改变干不干一个样，至于饭碗总要有一个人。总之，调查研究也要开创新局面，把它作为社会科学的科学实验来搞”。

第二，注意避免政策意见先入为主、一成不变。他告诫大家，政策观点的形成，对于问题的认识，是个不断修正的过程，不要被第一次的认识所束缚。他反复提醒说：“千万不要固定第一次对于事务的认识，那往往是错误的，一定要在不断地学习实践，听取不同意见中进行修正，最后的结论往往和你第一次的认识完全不同”。

从基本研究方法来说，杜润生经常强调的是思维方式问题，即处理好“归纳法和演绎法”的关系问题。在很多次会议上，特别是对年轻研究人员提出工作要求的时候，杜润生反复告诫大家要多用“归纳法”。

1984年2月，在中国农业发展战略讨论会上，杜润生在讲话中重点讨论了研究方法问题，他强调政策研究要“多用归纳法，少用演绎法”。他指出，归纳法和演绎法是两种论据不同的推理、证明方法。演绎法是根据一般原理推论、证明特殊事实的方法，其思维过程是从一般到个别；归纳法是用大量特殊事实推论、证明一般原理的方法，其思维过程是由个别到一般。归纳和演绎是互相联系，互相补充，密不可分的。”

为什么要多用归纳法？杜润生从两方面进行阐述：

一方面，所以要强调归纳法，是因为“新事物层出不穷，有了归纳法，就可以随时把新事物的发展变化，纳入我们的视野之内，避免犯教条主义错误，对广大中国土地上发生的新事物给以确切评价，用大量经验丰富我们的理论。实践永远是生动的、常青的，永远是走在理论前面的。有些新事物虽然本身没有多大力量，还不普遍，还没有起到左右全局的作用，但它有一种指路的作用”。

另一方面，所以强调归纳法，是因为“我们过去分析问题时常沿用演绎法，有不甚妥当的地方。把固定于自己头脑中的个别结论当做指导一切的原则前提，用于推断一切。在前提不定的条件下，应用演绎

法代替了真正的综合”。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列举了历史上一些由于忽视从生活中归纳提炼，而是从理论条条出发来制定政策而导致的严重失误。

杜润生讨论研究方法的时候，不仅重视一般研究人员的研究方法，而且重视权威机构或领袖人物的研究方法。在他看来，权威机构和领袖人物重视研究方法尤其重要。1997年2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座谈会上，他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他指出，人类社会必须有权威性机构和领袖人物，以保证公共事务的正常运行。但权威效应有可能是正面的，也有可能是负面的。这种差异取决于决策之前是否充分占有信息，从而做出正确判断。情况不明决心大，是违背科学决策原则的。可是，任何机构和领袖占有信息的能力都是有限的，而信息是无限的。所以，必须有更有效的信息处理方式，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建立社会广泛参与的信息处理机制。他以五十年代大跃进、大炼钢铁、亩产万斤等事件为例说明，当时已有科学界人士持否定态度，但是因为信息处理机制有问题，使得决策一错再错，最终导致历史悲剧。他进一步强调，对于权威机构来说，好的政策研究不仅应该能够收集、占有信息，而且应该能够广泛地开发信息源，建立一个有效的信息处理机制。这不仅涉及到研究人员的工作作风，而且还涉及到政府体制。从政策研究方法的讨论，进而剖析到政治体制的弊端，这显示了杜润生对于改革的深层考虑。

五、谈思想方法——“我没有主义，有主义也是经验主义”

“主义”之争贯穿百年中国近代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杜润生在研究工作中较少正面讨论这个问题。大致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杜润生关于主义的思考不断深化。他认为，“主义”问题意思不大，还是应该多做实实在在的调查研究，多讨论符合人民需要的政策安排。早年关于家庭承包的“主义”之争，随后关于私人能否购买拖拉机、可否准许雇工等问题，都有很多引经据典、一本正经的“主义”之争，当时非常严肃，后来感到可笑。他多次说：“我没有自己的什么主义，有主义也是经验主义”。他在表述自己“没有主义”时，还引用了邓小平的话。“听说邓小平1987年就说过，只要国民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民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杜润生文集下册，山西出版集团，2008年7月第一版第1464页）

杜润生说“我没有自己的主义”，这种表述简单而朴素，但是却含义深刻。我认为，这是带有根本性的思想方法。任何理论体系或者“主义”都只能解释局部社会问题，因此都是有局限、有缺陷的，所以，理论体系应该是开放的、发展的，应该是基于生活现实的变化而不断改进的。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杜润生更认同“经验主义”。在我看来，杜润生所说的经验主义，既有西方现代经验主义哲学基础，同时又基于对中国社会发展改革现实问题的观察和思考。进一步说，杜润生的“没有主义”或者是“经验主义”，不仅是一种哲学观点，或者具体来说是一种认识论立场，同时也是一种政策主张或政治主张。因为没有既定的“主义”，所以需要从现实经验的观察考量中形成认识判断，做出政策选择。由此更加可以理解，为什么杜润生特别强调归纳法。在经验论者看来，对事物因果关系作出判断的基本途径就是经验，归纳是经验的推理，或者说，归纳法是经验主义的逻辑基础。再进一步说，因为一切都是基于真实的经验总结，则经验主义立场又可以衍生出新的怀疑论。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和理论立场，所以杜润生具有开放、包容的心态襟抱，善于营造自由宽松的研究工作环境。

杜润生晚年思考的重点是民主问题。在我的印象里，他在1988年左右提出中国改革要过“市场关”和“民主关”。大致而言，在他离开领导岗位的前些年更多地讲市场，后些年则更多地讲民主。2008年，在一次改革30年座谈会上，他以九十五岁高龄发表300字讲话，主要是讲民主问题。杜润生如此强调民主，是与“没有主义”有内在逻辑的。因为他“没有自己的主义”，所以需要特别强调依靠民众

选择政策方向，从而决定“主义”。或者说，因为需要到民众中找“主义”，所以就有了民主的主张。如《道德经》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让百姓表达自己的心，在制度上就是民主。

中国为什么要发展民主？晚年杜润生主要是从三个方向来阐述。其一，从国际工运教训谈民主的重要性。2006年2月，他与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谈话时说：“孙中山为联合前苏联进行革命，搬用前苏联一党体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长期延续，加上斯大林的解释，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党的专政，这种定义未能与法西斯主义划清界限，导致苏共作为执政党的三垄断：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意识形态。使自己陷于孤立脱离群众，苏联解体于此不无关系”。他认为，现代各国实践证明：自由的风险远远小于专制的风险。（杜润生文集下册，第1339页）。改革就是要解决“三个垄断”问题，而出路在于民主。其二，从决策科学来讲民主的重要性。他说，“邓小平说‘我们不搞三权分立，不搞美国式的扯皮’，可是我们也看到，制衡机制可以使国家在重大决策上减少失误。草率决策引来的后果，可能比相互制衡贻误时日的损失更多、更大”（杜润生文集下册，第1065页）。其三，从解决农民问题来讲民主的重要性。他指出：“有一种说法，我国人民第一位的要求是发展，是生存和温饱，而非民主。这是对于发展权的含义做了狭义的解释，也低估了当代群众于生存权之外，还有其他基本权利的要求。这是把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分裂开来的思维模式”。（文集下册1056）他提出，中国发展民主的路径是“先办村民自治，进而实行乡镇政权直接选举，直至县政权的民主重建。要给农民完全的国民待遇”。（杜润生文集下册，第1175页）。

怎样发展中国民主？晚年杜润生主要强调公民自由。具体来说，他关于公民自由的主张，集中于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他认为，“在各项公民权利中，应着重保护言论、出版自由，因为有了言论自由，才可较为有效适时的集中人民的诉求，建立民主通道，作为政府施政的依据”。对于农民问题，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农民的组织，即农民协会问题。可以说，这是他念兹在兹、魂牵梦绕的问题，自1990年退出领导岗位起，他一直在为此奔走呼号。2001年7月，他在88岁生日座谈会上说：“说到解决农民问题，谈何容易。目前，我们必须重视保护农民民主权利，还应呼吁成立农民协会，进一步提高农民自组织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我们欠农民兄弟太多，截止今天，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政府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我在中央、在农口工作很长时间，对这方面的事情努力不够，抱愧于农民，抱愧于党，是应该检讨的。”杜润生把农民问题归结为权利问题和民主问题，对此，他充满了自我反思精神。他晚年曾经谈到，当他还在重要领导岗位时，如果在建立推动农民协会方面做更多工作，情况会有所不同，农民协会或将有所成长，所以他说“抱愧于农民”。

从根本上说，杜润生“没有自己的主义”，其实也是一种主义。正是因为没有“主义”，才使得他拒绝任何僵化的意识形态思维，以包容、宽松为领导风格，造就了九号院生动活泼、畅所欲言的工作氛围，使得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左右，都能够充分交流表达。当年的九号院领导人中，其实不独杜润生如此，王郁昭、朱厚泽、吴象、张根生、刘堪等人，就思想风格来说，都属于所谓“没有主义”的人。如果从深处探究，包容宽松不仅是一种心态胸怀和个人品行，更是一种思想格局和精神境界。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在中国改革史上显然属于黄金岁月，正在引起人们越来越高的研究兴趣。在本人看来，探讨这个时代的改革业绩和政策研究，无法不关注杜润生。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来源：当代农政，2024年1月4日）

谁在种地？不是问题的大问题

徐 勇

记得 20 多年前，我去俄罗斯访问，当地专家反复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人口这么多，如何养活？当时的俄国人口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面包尚是一个大问题。我亲眼目睹商店的货架空空和排长队购物的场景。同样是 20 多年前，美国学者布朗发表一篇重要文章《谁来养活中国？》，在他看来，随着中国人从吃饱到吃好的转变，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中国必然面临粮食短缺，并会引发世界粮食危机。西方智库学者总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头。如今，中国人主要依靠自己养活自己。但布朗的警世危言总是会提醒着一个拥有十四亿人的大国。如果说，20 多年前，“谁来种地”是时代之问，那么在当下，谁（who）在种地，为何（why）种地，如何（how）种地，正在成为新的时代之问。

时间序是我们观察问题的一种视角。在这一视角看来，时间是一个过程系统；这一过程系统分为不同时期并排列组合；不同时间序列面临不同问题并需要依次解决。现代化是一个时间系统，分为不同时期。当下的中国正在由现代化早期向中期转变，过往不是问题的问题，如今成为问题，而且是大问题，是系统性的大问题。

一、谁在种地？

面对这个问题，人们会脱口而出：农民啊！但我们知道，农民的定义有两种：一是作为身份的农民，即英语中所说的“Peasant”。这个词有农奴的含义，即人一出生便依附于土地，依附于土地的主人，即封建主。身份农民是与生俱来，别无选择的。我们过往的农民都是如此，从一出生便是农民，是农民就得种地，不种地就没有得吃，这是天经地义、日用而不知的惯习，谁在种地根本不是问题。但在现代化中期，谁在种地则成了问题。现代化是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导向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既是现代化的前提，也意味着城乡差别。在现代化早期，面临的是大量农村人口的生存问题，可以通过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和土地承包来解决，农民获得土地就获得生命。在现代化中期，面临城乡差距，人们有了更多选择，农民离开土地有可能获得新的生活。农民的后代并不是与生俱来只能种地，种地也不只是原有的土地的主人，这就是土地经营权的流转。由此会产生一种以种地作为职业的农民，这就是英文中所说的“Farmer”。

当今，究竟是身份农民，还是职业农民在种地成为问题。

二、为何种地？

这个问题原本不是问题。为谋生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中国的文明史就是以土地展开的。过往讲中国人“土气”，实在是因土地而生。但是，到了现代化中期，人们愈来愈依靠与市场交换获得生产和生活资料，为何种地便成了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种地不赚钱”。种地的生产资料需要购买，种地的收获要出卖，这之间的价格存在反差。我记得 40 多年前，一斤大米一角四分，如今价格涨了十倍，而

当时的工资是 50 多元，如今涨了 100 多倍。

根据市场理性，人是趋利避害的。种地不赚钱必然导致农村人口离开土地，从事其他职业。一般来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职业农民会愈来愈多，土地会愈来愈集中，总体上呈大国大农的趋势。但是，中国是在一个大國小农基础上推进现代化的，庞大的小农基数难以简单依靠城市化加以消化。相当多数的农民对土地仍然有一种情感、一种预期，或者有一种无奈，是一种不得已的自我选择。尽管种地不赚钱，他们也仍然要种地，这是历史的巨大惯性，也需要决策者有足够的历史耐心。

三、如何种地？

这在过去也不是问题。用简单的劳动工具与土地交往从而获得劳动成果，数千年来都是这样过来的。记得我当农民的五年时间，头脑特别简单，言语也很少，因为整天与土地交往，即“面朝黄土背朝天”。当下中国正进入现代化中期，除了土地规模集中以外，更重要的是土地的集约化经营。早在近百年前，美国学者卜凯高度关注中国的农业问题，他通过调查发现，中国的贫困在于农业落后，农业落后在于劳动的无限投入。尽管劳动投入可以精耕细作，但结果是人口增长。人口的无限增长与土地的有限增加成为基本矛盾，这种农业经营的结果是报酬递减，即现在所说的“内卷”。卜凯因此强调必须改变过剩劳动替代资本的状况，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只是传统农业的改造需要大量投入，而在现代化早期，最缺乏的恰恰是资本和技术，更难以将其投入于农业。

在现代化中期，这一百年难题有了条件破解，愈来愈多的资本和技术开始进入农业。但其过程却十分复杂，结果也不都是那么美妙。我的一位好友近年决定投资农业，专门去咨询农业专家，得到的回复是：又来了一个往“坑”里掉的！为什么农业是个“坑”呢？现代农业是高效农业，或许也是高风险农业。问题在于如何承担风险？

由此看来，谁在种地，为何种地，如何种地，在当下不仅是问题，而且是系统性的大问题，是国家高度关注的战略性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呼声，也是学术的先导。有了问题，就要弄清问题。要弄清问题就得实地调查。以实地调查回答时代之问。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政治学部部长。来源：田野政治学，2024 年 1 月 22 日)

从“村落终结”到“社区再造”

——乡村空间转型的实践表达

郭占锋 田晨曦

问题缘起

自改革开放尤其是 1984 年乡镇企业全面复苏以来，市场化、城镇化与现代化要素乘着政策的东风被送进乡村，冲击着传统村落边界与社会组织架构，衍生出“城中村”、“村改社”（集中居住型社区）、“易地搬迁移民社区”、“企业型社区”等新型社区空间，同时也加速着传统村落的衰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平均每年约有 9585 个行政村正因种种原因消匿于乡土中国的巨幅版图上，带走数亿人的“根”与“思”，学界称之为“村落的终结”（李培林，2002）。

关于“村落终结”现象的讨论往往在快速城镇化、工业化、市民化的背景下展开，遵循着“城市发展扩张—侵占乡村空间—多元边界动摇瓦解—传统村落终结”的演变脉络。在此过程中，“村落终结”被视为城市不断包围农村形势下被动形成的结果。李培林（2004）就“城中村”现象，首次提出了“村落终结”这一历史性论断。田毅鹏和韩丹（2011）则进一步明晰了“村落终结”的内涵，并将其分为如下三类：一是城市边缘地带的村庄被迅速扩张的城市所吸纳，如“城中村”；二是远离城市的偏僻村落在过疏化、老龄化背景下走向终结，如传统村落；三是在行政力量之下，通过村落合并形式走向终结的村落，如“集中居住型社区”和“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等。

在既有学者对“村落终结”的理论探讨中，多将“城中村”视为研究对象，将城镇化、市场化与现代化对传统乡村空间的侵蚀与瓦解看作新型社区空间再造的基础假定。然而，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在乡村建设过程中，乡村空间与城市空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现代化的发展是否意味着必须牺牲乡村空间来成全城市空间的发展延伸？面对外部力量的侵蚀，传统乡村是否只能被动接受终结命运，应该采取怎样的姿态来应对？这些是本文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为了回应上述问题，本文以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为例，通过深度剖析该类“自我终结”式村庄传统属性的消解过程，及其在与市场对接中新型社区的再造过程，尝试归纳传统村落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发展转型的成功机制，在对村落终结的“理想类型”进行有益补充的同时，以期对当前城乡融合发展研究贡献一些理论思考。

一、“自我终结与再造”：传统乡村社区实现空间转型的理性选择分析框架

“‘空间’意义上的城乡融合，即所谓的‘城乡空间融合’，事实上就是一体化的整体思维，将城乡空间看作动态的整体空间，城乡空间中的权力、资本、社会关系等要素有序流动，共同维系城乡空间秩序再生产”（张扬金和邓观鹏，2021）。这种空间整体性思维表明城市与乡村空间并不是割裂对立的，乡村可以通过自身空间的有机更新与城市进行互动和关联（陶青青，2023）。对此，本文尝试将新内生发展理论融于村落“空间生产”实践，在弥补后者对行动主体内生性关注不足的基础上，提炼适用于中

国发展实际的乡村空间变迁理论分析框架——融“空间开放—自主规划—组织理性—利益联结—内外联动”于一体的“自我终结与再造”框架。

该框架将城市和乡村看作中国社会空间的“一体两面”，用整体性发展思维取代对立、依附的片面性空间认识，强调二者的互构与互补性，以此恢复村落的空间话语。其中：①空间开放是实现“自我终结与再造”的前提。开放意味着村落空间要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城镇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进程，在开放过程中，传统村落边界（自然、经济、行政、社会、文化等）式微，部分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传统要素消解，村落空间面临终结与转型。②自主规划是实现“自我终结与再造”的建设力量。村落地方性力量是未来发展的潜力和主力，只有构建自身的发展主动性，基于特色乡村性打造发展的“差异性空间”才能免于被城市化吞并，将空间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握在手中。③组织理性是实现“自我终结与再造”的特色保障。在村落空间中，以村“两委”为代表的地方力量，始终代表着村民的利益，大多拥有规划空间的决定权，同时履行维护空间正义的义务。④利益联结是实现“自我终结与再造”的核心驱动力。现代性身体再生产着空间，只有将身体留住并凝结为共同体，才能在持续保持空间活力的同时强化抵御外来风险的能力。⑤内外联动是实现“自我终结与再造”所要达致的目标和理想形式。内外联动为“地方”与“超地方”要素的自由流通、上下互动提供了可能，将城市空间和村落空间联结为一个整体，有益于城乡融合发展目标的实现。

二、案例介绍与研究方法

袁家村原本是一个地处西北内陆、远离城市、资源匮乏的贫困村庄，面对城镇化、市场化、现代化浪潮的强大冲击，没有和广大传统村落一样被动接受被吞噬、淘汰、边缘化的命运，而是在一次次的自觉尝试中，完成了产业转型乃至就地城镇化的空间转型任务，其“自我终结与再造”实践无疑为传统村落空间的发展变迁提供了一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本文采取单案例研究方法，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对袁家村的终结与再造历程进行最大程度的社会化还原。

三、案例描述：空间转型视角下袁家村的“自我终结与再造”实践

（一）空间开放下的传统属性消解与“村落终结”

1. 市场要素渗透：地域空间商品化。在市场要素的渗透下，袁家村的村民、土地、自然景观、农业资源等核心要素变为筑建空间的生产力、原材料甚至商品，在创造资本与形成多样社会关系的同时，也实现着土地的商品化、粮食的商品化甚至空间的商品化，促进地域空间由自然物质空间向社会空间转变。传统村落“独立封闭社会边界的社会实体”属性消解（毛丹和王萍，2014）。

2. 权威力量主导：抽象空间碎片化。纵观袁家村的三次产业转型过程，村庄的空间变革自始至终充斥着国家、政府部门、乡村精英、村级组织、旅游公司、专家学者等的规划与主张。袁家村在一个严格控制的总体框架中，被分割成形形色色的空间：居住、劳动、休闲、娱乐、旅游等，使其所展示的形象与这些形象所塑造起来的需要完全相符。

3. 多元社会关系交叉：社会空间复杂化。多元主体的入驻为袁家村市场的拓展与创新带来了活力，但也使得其空间关系更为复杂。空间中凝聚着商户与游客、村民与村委会、村委会与旅游公司、商户与村民等“扯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利益关联。

（二）自主规划下的社区再造与共同体生成

1. 地域空间再造：市场共同体生成。袁家村在 0.4 平方千米的地域空间再造的基础上起步，不断突破村域、县域、省域、国域边界，随产业转型与融合，实现地域空间的无限延伸，促进市场共同体不断发展壮大。

2. 文化空间再造：记忆共同体生成。袁家村通过挖掘村庄原生文化、整合地区传统文化、吸收现代都市文化，再造起一个完整且极具时空性、活态性、开放性与展示性的文化空间。在异质性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村庄的多元利益主体逐渐形成统一的认同，营造凝聚力与感召力并存的社区精神与社区意识，日益联结为团结的“记忆共同体”。

3. 社会空间再造：秩序共同体生成。为协调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维持社区秩序，袁家村通过加强成员间利益关联，强化成员对社区与社区组织的整体认同，助力居民主体的整体增能，优化社区制度设计（顾东辉，2021）等措施，打造秩序井然、利己利他、合作共赢的和谐共同体。

四、案例剖析：袁家村实现“自我终结与再造”的动力机制

（一）空间开放：打造“内外联动”的共生发展格局

空间开放是实现“自我终结与再造”的前提。空间开放意味着村落要摆脱传统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发展思维，在对地方空间充分认识的基础上，一方面适度开放自然、经济、文化、社会等边界，允许“超地方”要素的进入，另一方面要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超地方”，打造内外联动的共生发展格局。当然，这是一种有选择、有干预的开放，是“坚守自我”基础上的开放。就袁家村（地方）与“超地方”的关系来看，在积极寻求“地方打造”与“超地方融入”的发展平衡中，允许并主动干预“超地方”力量介入，在恢复空间工具属性的基础上，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城乡融合发展与全民富裕的整体性目标。

（二）自主规划：掌握产业发展与空间转型的自主权

自主规划是实现“自我终结与再造”的建设力量。起初，袁家村并不具备学界所划定的“城中村”、“超级村庄”的发展条件，它距离城市中心远，自然和人文条件不突出；也并非易地搬迁社区、集中居住社区等政府重点扶持的典型村庄，可以说毫无地缘、资源优势可言。其成功蜕变正是源于对村庄可持续发展路径的主动探索与自主规划，最终在旅游业这一特殊产业的支持下，实现创新与突破，在促成传统要素消解的同时，自身也生成“非城非乡”的新社区空间，成为超越地域与国界的新市场中心。

（三）组织理性：再造发展与和谐共存的正义空间

组织理性是袁家村实现“自我终结与再造”的特色保障。以组织理性的权威取代单位个体的个性权威，是营造客观公正的基础。与“城中村”、企业型村庄等相似，袁家村对村级组织有强烈的依赖感，村民也已实现由传统小农向“理性经济人”的转变。但不同的是，袁家村村民的个体理性始终依附于组织理性，在组织理性的统一规划下行动。从基本职能来看，各类村级组织或是对村中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负责，或是依法依规推动多方利益主体的有序生活，或参与或支持分红事宜。但在袁家村，其村“两委”显然更具有话语权。在乡村精英领导下，村“两委”通过长远规划，再造着发展与和谐共存的正义空间。

（四）利益联结：构建“共生共担共享”的命运共同体

就袁家村的变迁历程来看，虽遵循“经济边界—自然边界—行政边界—文化边界—社会边界”的开放次序，在资本介入、权威规划、多元主体共存的互动过程中走向终结，同时开启新社区共同体的建设，但基于发展旅游业态的异质性需求，其产业发展的可持续与新社区共同体的缔造并不能仅用乡缘与业态

的适配性双向互动机制进行解释。究其原因，此种适配性互动忽视了村民由传统小农向理性社会个体的身份转变。袁家村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将“利缘”纳入乡缘与业态的适配性互动过程，通过创设“股票市场、合作金融”的股份合作新形式，将本村村民、外村村民、打工者、投资者、管理者等多元主体置于同一利益链上，纳入共生共担共享的市场共同体中。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解码陕西袁家村由终结到再造的空间转型过程，力图寻找传统村落在城镇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冲击下得以获得空间发展权的实践方式，最终提炼出融“空间开放—自主规划—组织理性—利益联结—内外联动”于一体的村落“自我终结与再造”框架。其中，空间开放是实现其“自我终结与再造”的前提。它要求在对地方空间进行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有干预性地开放空间边界，以促进“地方”与“超地方”间要素的流通；与此同时，地方也要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城镇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进程，打造起“内外联动”的共生发展格局。自主规划是实现“自我终结与再造”的建设力量。村落地方性力量仍是未来发展的潜力和主力，只有构建自身的发展主动性，基于特色乡村性打造发展的“差异性空间”才能免于被城镇化吞并，进而将空间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握在手中。组织理性是实现“自我终结与再造”的特色保障。村“两委”通过对社会分层、收入差异等进行适时调整，对村落空间进行科学规划、再造，使得资本与乡土互融，共同维持空间的正义与平衡。利益联结是实现“自我终结与再造”的核心驱动力，要求关注空间中多元主体的重塑与联结，可通过主体赋能、合作共赢实践等凝结成“共生共担共享”的命运共同体，在留住人才、持续保持空间活力的同时强化抵御外来风险的能力。内外联动是实现“自我终结与再造”所要达到的目标和理想形式，强调整体性视角看待城市空间发展和村落空间发展，主张在城乡融合中实现共生。

基于以上结论，可以得出以下几点促进传统村落空间转型的启示。第一，地方政府要树立整体性发展意识，将传统村落的发展纳入地方性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地方”与“超地方”间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政策体系，为实现“内外联动”打好基础。第二，改变单一的福利输送、直接干预的支持方式，改变刚性规划的开发方式，将空间发展话语权交还给村落自身，给村落空间参与市场化和现代化的机会；与此同时，也要完善相应的保护和激励措施，确保村落和农民的利益不受到侵害。第三，村落空间要有主动求变、自觉探索的勇气，也要有“自觉”的意识。第四，始终紧握空间发展的主动权，这是免于被城镇化、市场化及现代化吞并的首要前提。

（作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来源：《中国农村观察》2023年第5期）

人生漫漫 岁月如歌

——百岁老人回忆录

张效菊

岁月如梭，转眼百年。回顾往事，悲欢离合，跌宕起伏，尽洗铅华。告别耄耋，喜迎期颐；思路尚清，笔力尚在；百年浮云，如影随形；择其要者，跃然纸上；休谓自传，聊以自慰；以告后人，以飨子孙。

青春年华 孜孜以求

1921年10月，我出生在北京一个中产家庭。祖父经商，父亲在银行任会计师，家道虽不殷富，但也衣食无忧。1933年，考入北京慕贞女子中学。1939年，考入孙中山先生创办的中国大学（以下简称中大）中文系。青年时期通过慕贞、中大的良好教育，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功底，为解放后报效国家、投身农业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我被分配到原农业部机垦处，主要研究推广农机设备。为更好地推广农业种植技术，我和同事一起组建农业电影社，通过图文并茂的幻灯片，向广大农民宣传科学种植技术，提高粮食和蔬菜单产，减少病虫害发生。1950年，我爱人赵世儒牵头组建国营农场物资供应站，我随后也调到供应站，在办公室负责文书工作。1952年，我调到农业部农业机械总局，我先后在办公室和技术处从事档案和农具统计工作。我在农业机械局工作期间，全国农机推广应用工作取得长足发展，农业机械替代了部分劳力，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可以实现规范化生产，有效保证了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这些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全国农机推广应用广大同仁的努力，我很荣幸也为此贡献了微薄之力。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是我和赵世儒人生中最精彩的十年，我们参与并见证了我国农业机械化的蓬勃发展，国家也从民生凋敝、满目疮痍逐渐形成农业工业基础生产能力，并为之后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拨云见日 发光发热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被调到农学会编辑部工作，并提升为副处级。为了不辜负组织的栽培，我努力工作，为农业学术交流助力农业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1982年，我来到离退休干部局北京站活动站工作，负责发放工资、组织老干部参加各种有益的活动等。

虽然已过天命之年，但是我感觉有使不完的精力，工作热情甚至超过刚工作的那些年。我争分夺秒、任劳任怨，与国家改革开放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同成长共进步。在此期间，我的三个孩子也相继组成了温馨的家庭并有了可爱的下一代，他们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奋发有为地工作。至此，祖孙三代，其乐融融，使我的心情倍感舒畅。

老有所学 老有所为

我于 1985 年办理了离休手续，虽然自己年逾六十，但思绪尚清，体力尚在，生活无忧。正所谓，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我认为，这是人生中最后的时光，要倍加珍惜。我要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用余下的生命之光永远追随党。1986 年 12 月 13 日是值得我铭记的一天，因为经组织批准，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终于实现了自己 30 多年追求。

我还尽可能参加各种有益身心的活动，力争做到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离休前，我就报名了朝阳区老年大学，选了 2 门书法绘画课，主学工笔画。在曹国鉴老师的耐心辅导下，我的工笔画水平提高很快，在花鸟人物方面尤为出色，受到老年大学老师的表扬，部分优秀作品还被农业部相关画册收录出版。之后，农业部东大桥活动站成立了书法班，聘请何玉璋老师教老同志书法，由我担任班长。何老师功底深厚，执教严格，2 年的书法学习使我受益匪浅，也陶冶了性情。1993 年，农业部东大桥活动站组织成立了京剧小组。我自幼爱好京剧，欣然报名参加，每周在科协办公室活动一次。由于京剧组越办越好，农业部老干部局每年还给我们下拨经费，购置一些乐器，鼓励我们不断提高京剧水平。我们不定期与外交部、交通部、人社部、教育部等单位老干部活动站京剧组进行交流演出，还请孙毓敏、刘勉宗等老师教我们京剧理论基础。由于大家刻苦练习，京剧演唱水平越来越好，农业部每逢节日联欢，都安排我们上台演出，受到部领导和观众的高度评价。1996 年，老干部局成立歌唱队，农业部请海政文工团老师教我们运用和声演唱“四渡赤水”等歌曲。我们从基础学起，练习了将近一年，第二年参加了全国十几个部委在政协礼堂举办的汇报演出。中央领导同志朱镕基、李岚清等观看了演出，我们的出色表演获得了评委们的一致好评，荣获了汇报演出的二等奖。我最后一次上台演出是 2015 年 9 月，以 94 岁高龄参加农业部“忆抗战 庆两节——老同志为党的事业增添正能量文艺汇演”，铿锵有力、字正腔圆的演唱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

耄耋期颐 天伦之乐

2002 年，我从东大桥农丰里搬到了昌平的蓬莱公寓，远离了喧嚣，安静的环境，虽已是耄耋之年，但是生活还基本能够自理，闲暇之余，我在家里写一些字，赋几首诗，画几幅画，绣几张十字绣。天气好时，与孩子们或到公园游览，或去郊外踏青，或来餐馆小聚，或登门看望亲朋好友，生活过得安逸而充实。

近百岁时，我思路尚清，除了听力减弱外，其他生理功能并无大碍。每天看报纸、看电视、煲电话，上网玩平板电脑，还能够用微信与亲朋好友视频聊天，交流图片信息。三年前不小心有过一次骶骨骨折，大家以为我从此就要卧床不起，没想到经过精心医治和康复，竟然站立起来行走如初，创造了百岁老人骨伤恢复的奇迹。农业部老干部局领导定期来看我，无不夸奖我的生活和生存质量堪称一流，真可谓安享天伦之乐。

在蓬莱公寓居住的这段时间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七家街道办事处和蓬莱社区居委会领导对我的关心与重视。由于我在蓬莱社区年龄最高，又是离休干部，他们对我非常尊重，经常登门拜访问寒问暖，邀请我参加街道社区的各项活动，每次活动前都特意向大家介绍我并让我做重点发言。我偶尔也兴致勃勃挥毫泼墨，给居委会和邻居们留下一些墨宝。特别是我有幸参加了 2018 年六一儿童节活动，生动活泼的少先队员给我系上红领巾，仿佛使我回到少年时代。我给他们咏诵了弟子规：“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砺”，勉励他们做红色的接班人。北七家街道办事处知道我能写会画，他们的内部刊物《七

星指南》还向我约稿，我也欣然命笔，略赋诗词奉上，编辑部都刊登在主要版面，还给予一点稿费以资鼓励。

2019年，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喜庆日子，我作为离休干部，荣获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这是对我一生的最大褒奖，也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光。应农业部老干部局东大桥活动站和北七家蓬莱社区的约稿，我挥毫写下“祖国万岁”并创作了诗歌“祖国颂”，这两个作品参加了农业农村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书画摄影展，部领导在我的作品前驻足良久并啧啧称赞；作品还同时在《七星指南》杂志刊登。

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而我不但度过了古稀，跨过了耄耋，竟然走到了百岁关口。一路的积淀和感悟，让我在跌跌撞撞中学会了勇敢与面对，在沉沉浮浮中学会了宽容与平和，在繁繁冥冥中学会了放手与豁达，在纷纷扰扰中学会了自持与淡泊。回首往事，五味杂陈，我在这里要衷心的说三声谢谢。一是感谢上苍的眷顾，多少亲人、多少挚友、多少同事都先我而去，而我还可以沐浴大自然的阳光，享受亲情的温暖，这确实是冥冥之中上苍的偏爱。二是感谢家人的陪伴，如果不是家人的悉心照料和耐心呵护，很难想象能够走到今天。三是感谢农业农村部 and 各级组织以及亲朋好友的帮助，无论是我工作期间还是离休之后，是各级组织和亲朋好友的帮助与支持，让我获得了更多的快乐与荣光。最后，我有几句话想与大家分享：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作者：老干部局退休干部。来源：《老干部园地》）

“无锡模式” 凸显中国经济治理活力

刘少山

在人们对经济前景感到忧虑之际，中国加大了培育技术创新的力度。江苏省无锡市是地区性技术政策如何发挥作用的一个典型例子。与其他国家的公私部门之间存在明显界限不同，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方面深度参与。无锡经济的显著增长表明这种政府主导的举措在科技领域是有效的。过去十年，这座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在 2021 年，该市人均 GDP 超过北京，实现重要里程碑。

无锡历来以其强大的工业实力而闻名，尤其是纺织业。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它的了解相对较少。然而，从传统制造业向科技行业的转变推动了无锡过去十年的显著增长，其中半导体行业发挥了关键作用。今天，无锡拥有 600 多家半导体公司，年总产值达 2000 多亿元人民币，约占该市 GDP 的 15%。

无锡经济蜕变的催化剂是 2007 年的一起关键事件。那一年，太湖遭遇严重的蓝藻污染。这场由微生物快速生长和沿湖工厂排放工业污染物造成的环境危机引发广泛关注。这促使无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远离污染行业。无锡市政府决定将重点转向高科技、创新驱动型行业。

由于缺乏合适的基础设施、熟练的劳动力和成熟的公司，无锡市政府进行了大量融资，为创建高科技工业园区、更新基础设施和吸引人才提供资金。这些投资主要用于升级基础设施。无锡建立了最先进的工业园区和创新中心，以吸引科技公司、研究机构和初创企业，并特别关注半导体行业。与此同时，无锡市政府为支持新兴科技企业注入大量资金。大量投资也用于加强交通网络和研究设施，包括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无锡市政府欢迎各类科技公司和专家，只要他们聚焦创新。这为无锡开启了爆炸式增长和转型的时代，使其成为科技和创新中心。

无锡仍在对其科技政策进行微调。该市还公布了有关构建“465”现代产业体系的新发展战略。这项计划旨在引导投资进入四个成熟的高科技产业：物联网、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此外，该战略还支持六个关键产业——高端装备、高端纺织服装、节能环保、特色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含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同时培育五个新兴产业，即人工智能和元宇宙、量子科技、第三代半导体、氢能和储能以及深海装备。由于认识到科技行业刺激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许多城市的政府正在考虑利用财政政策引导本地经济转向创新驱动模式。

“无锡模式”体现了这种战略转变。这一模式代表了公共和私营部门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一种独特的融合方式。地方政府既充当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又承担风险资本家的职能，积极培育技术创新。这种多角度的参与凸显了中国经济治理充满活力的本质。在中国，促进技术进步被视为地区繁荣的关键驱动力。

（作者：美国计算机协会美国技术政策委员会成员、美国全国公共管理研究院技术领导小组顾问团成员。来源：香港《南华早报》网站，2024 年 1 月 5 日）

多维度看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

程郁 宁夏 殷浩栋

生活质量体现在收入、消费、生活环境、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多个维度，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需要各方面的综合努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高度重视农民增收和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持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全面改善、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农村居民生活质量获得跨越式提高。

农村居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收渠道明显拓宽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各地方各部门努力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通过农业提质增效、发展乡村产业、引导转移就业、加大补贴支持和增加财产性收入等多种途径，构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

农村居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2022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133元，比2012年增长140%，年均增长9.15%，分别较人均GDP和农村消费价格指数年均增速高1.17个和7.13个百分点，既跑赢了人均GDP增长、更大幅跑赢了农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购买力的增强有力支撑了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更快增长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比城镇居民快1.75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从2012年的2.88下降为2022年的2.45。

从收入结构看，农村居民增收渠道明显拓宽，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随着农村外出务工人数和工资水平的不断增长，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2012年的37.23%提高到了2022年的41.97%。支农惠农补贴力度的加大、社会保障网的织密织牢以及家庭成员带回收入的增加，使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占比从2012年的17.18%提高到2022年的20.88%。农村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动各类农村资产逐步得到有效盘活利用，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占比从2012年的1.97%提高到2022年的2.53%。相应地，农村居民人均经营性净收入的占比从2012年43.63%下降为2022年的34.63%。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和农村商业物流服务体系持续完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快速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升级。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6632元，比2012年增长149.47%，年均增长9.57%，年均增速较城镇居民快3.66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倍差从2012年的2.57缩小到2022年的1.83。

农村居民消费日益多样化，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向改善提高生活质量转变。以食品消费为代表的生存性消费占比显著下降，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2012年的35.9%降低到2022年的33.0%，标志着农村居民生活的富裕程度逐步提高。食物消费中体现生活水平改善的动物性产品消费量显著增加，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肉类、蛋类、奶类和水产品消费量分别为33.7千克、13.1千克、8.4千克和10.7千克，

较 2012 年分别增长 61.24%、122.03%、58.49%和 98.15%。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以旧换新等促进农村消费政策的接续推进，激活农村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了农村居民家庭生活需要。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快速提高，并呈现提档升级特征，各类家用电器的普及率显著提升。2022 年每百户农村居民拥有汽车 32.4 辆、移动电话 266.9 部、冰箱 103.9 台、洗衣机 96.8 台和空调 92.2 台，较 2012 年分别增长 390.91%、34.93%、54.38%、44.05%和 262.99%。

农村居民发展性、享受性和服务性消费较基本生活消费更快增长，反映了农村居民生活更加丰富、更有品质。2022 年农村居民人均居住、交通通信、医疗保健和文教娱乐支出分别为 3503 元、2230 元、1632 元和 1683 元，较 2012 年分别增长 153.66%、211.02%、191.43%和 148.6%，分别较食品衣着支出增速高 67.79 个、125.15 个、105.56 个和 62.73 个百分点；2022 年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为 6358 元，较 2012 年增长 154.78%，较食品衣着支出增速高 68.91 个百分点。

农村生活环境全方位改善，民生福祉不断增进

农村生活环境的全方位改善有力保障了农村居民生活质量获得全面提升。我国在农村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和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加力投入，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发生了改变，农村居民民生福祉不断增进，农村居民正逐步过上现代文明生活。

公共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提高了农村生产生活的便利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持续推进“四好”农村路、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电信普遍服务等民生工程项目，农村路网连通、供电保障和网络普及明显改善，为农村居民多渠道增收和过上现代化生活创造了条件。截至 2022 年，全国农村公路里程达到 453.14 万公里，十年间增长 85.3 万公里。乡镇和建制村通硬化路的比例分别达到 99.9%和 99.8%，较 2012 年分别提高了 2.56 个和 13.52 个百分点，农村公路列养率达 100%、优良中等路率达 89.3%，基本形成便捷高效的农村公路网络。持续推进农村客运公交化运营，农村地区公交服务覆盖广度和深度显著提升，乡镇和建制村通客车率分别达 99.8%和 99.7%。

全面提升农村地区电力供应保障能力，有力保障了农村居民现代化生产生活的用电需要。全面实现农村边远地区电网覆盖，彻底解决了无电人口用电问题。精准升级农村电网，2022 年农村电力网用户平均供电可靠率达到 99.883%，较 2012 年提高 0.044%，户均停电时间从 2012 年的 14.16 小时下降为 2022 年的 10.22 小时，农户家庭用电和农村生产用电得到更加稳定的保障。

互联网基础设施不断向农村偏远地区延伸，网络覆盖越来越广、资费越来越低、网速越来越快，农村居民搭上了互联网的“快车道”。2022 年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61.9%，较 2012 年增长 38.2%，行政村通宽带比例从 2012 年的 87.9%增长至 100%，农村宽带用户总数达 1.76 亿户，较 2012 年增长 331.4%。网络基础设施的改善为“互联网+农业”、农村电商、直播等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创造了机遇。2022 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2.17 万亿元，较 2014 年增长了 11.05 倍；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5313.8 亿元，较 2014 年增长了 4.3 倍。

农村人居环境的显著改善提高了农村居民生活的舒适度。有力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农村危房改造以及农房和村庄建设现代化，农村居民实现住房安全有保障、居住品质有提升。“十三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累计建成 266 万套安置住房，实现 960 万人乔迁新居，累计改造农村危房 2400 多万户，历史性解决了贫困群众的住房安全问题。农村住宅混合结构以上面积占比从 2012 年的 64.17%，提高到了 2022 年的 77.45%。2020 年乡村家庭户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 46.8 平方米，较 2010 年增加 15.1 平方米。

大力实施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农村居民生活用水的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十年来累计解决了 2.8 亿农

村居民的饮水安全问题，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逐年提高，2022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87%，较2012年提高了12.4个百分点。

扎实推进村庄清洁行动、农村厕所革命、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治理等工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显著，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和品质持续向好。2022年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73%，较2020年提高5个百分点；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31%，较2012年提高24个百分点；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理的自然村比例达91%，较2012年提高了60个百分点。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提标扩面提高了农村居民生活的保障水平。农村医疗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从2012年的240元提高到2023年的640元。特别是2016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全面实现整合并轨后，农村居民医保药品和就医定点医院数量、医保报销比例获得更大幅度提升，农村居民看病的经济负担明显减轻。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持续改善，农村居民卫生保健水平显著提高。2022年农村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6.55人、卫生机构床位6.25张，分别比2012年增加3.14人和3.14张，与城市的差距分别比2012年缩小1.48人和2.36张；农村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为16.6/10万、5.7‰和8‰，分别较2012年下降35.16%、54.03%和50.62%。

普惠学前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改变了农村幼儿上不了、上不起幼儿园的状况。2021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农村幼儿园1241.94亿元，较2012年增长295.12%；农村幼儿园共有98518所，比2012年增长56.2%，其中农村教育部门办园和民办普惠性幼儿园共82359所，占农村幼儿园总数的83.6%，农村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90.6%，基本实现每个乡镇有一所公办中心园，大村独立办园、小村联合办园。

持续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基本办学条件和办学能力，农村学校硬件设施和师资力量显著增强。2021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农村义务教育55578.21亿元，较2012年增长6.76倍；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每百人拥有的数字终端设备和网络多媒体教室数量分别到达20.78台和3.71间，较2013年分别增长1.68倍和3.84倍。2022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本科以上学历专任教师占比达76.01%，比2012年增长35.29个百分点。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覆盖农村义务教育学校12.38万所，受益的学生达到3.5亿人次，受益学生的体质健康合格率从2012年的70.3%提高至2021年的86.7%。

农村养老保障水平逐步提高，2014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整合并轨后，农村居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实现与城镇居民同步提升，农村老人平均每月领取的养老金从73元提高到了205元。农村机构与互助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正加快建立，越来越多的村建立起敬老院、日间照料中心、老年食堂、互助社等养老服务设施，农村老人的生活得到更好的照护。2022年全国共有农村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23.2万个，较2015年增长13.5倍。

新时代以来，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农村居民各方面的生活质量均得到实质性改善，获得感和幸福感显著提升。但也要看到我国农村各方面基础仍然薄弱，农民收入增长还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和压力，农村要具备现代化生活条件还需长期努力，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仍须持续加力补齐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人居环境等短板。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带动农村居民生活的全面持续改善。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来源：农民日报客户端，2023年12月27日）

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送：有关部委司局、全国各省农委（农业农村厅）中国管科院机关及各研究所、中国食药促进会
发：中国食药促进会秘书处及各部门、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各处、室、中心及下设机构

总 顾 问：刘 坚 郭书田 毛振宾
副 主 编：谢久忠 辛 梅
邮 箱：zgynjs@163.com moagov@163.com
网 址：www.zhongguanyuan.com.cn
www.moagov.cn

地 址：农业农村部北办公区 16 号楼、18 号楼



主 编：胡兆荣
编 辑：孙正恩 石 卉
邮 编：100125 100810
电 话：010—59195293 66117652
010—66067899 66167899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南 3 楼、4 楼

